

广州人文历史丛书

广东宗教简史

雷雨田 马建钊 何方耀 等著
陈永祥 张朝发 胡巧利

GuangDong
ZongJiao
JianShi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百 家 出 版 社

广州人文历史丛书

广东宗教简史

雷雨田 马建钊 何方耀 等著
陈永祥 张朝发 胡巧利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
百 家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东宗教简史/雷雨田等著. —上海:百家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 - 7 - 80703 - 683 - 8

I. 广... II. 雷... III. 宗教史—广东省 IV. B9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6236 号

丛 书 名 广州人文历史丛书

书 名 广东宗教简史

著 者 雷雨田 马建钊 何方耀 陈永祥 张朝发 胡巧利等

责任编辑 胡国友 丁翔华

装帧设计 梁业礼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总社(www.shwenyi.com)

百家出版社(上海市茶陵路 175 弄 3 号 20003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句容排印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8.625

字 数 492000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300 册

ISBN 978 - 7 - 80703 - 683 - 8

定 价 56.00 元

“广州人文历史丛书”编委会

顾问 李明华 郭 凡

主编 何大进

编委 邱 捷 张人杰 康保成 刘晓明 赵春晨
肖 星 吴小强 冷 东 纪德君

《广东宗教简史》作者分工

序言 雷雨田

广东佛教 何方耀 胡巧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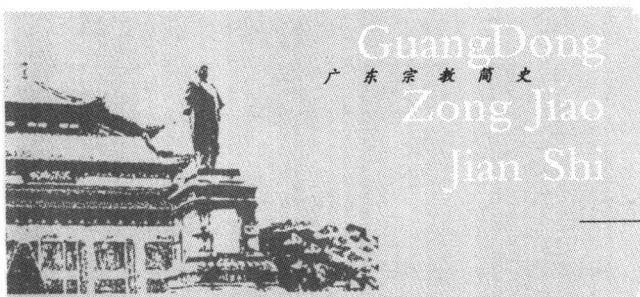
广东道教 陈永祥

广东伊斯兰教 马建钊

广东天主教 雷雨田 张朝发 张 琳

广东基督新教 雷雨田 张玉鹏 郑 慧

2000 年以来广东宗教现状 徐建芬 张 霞 薄建娜



GuangDong
广东宗教简史
Zong Jiao
Jian Shi

内容提要

岭南文化长期以来融汇中原文化与海外异域文化,形成了包罗万象、异彩纷呈的雄浑格调,本土与外来宗教在其中起了重要的渗透、催化与凝聚作用。从两晋道教金丹派理论奠基人葛洪、唐代佛教禅宗六祖惠能和创建伊斯兰教怀圣寺的阿布·宛葛素到明末清初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大潮中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基督新教马礼逊牧师及其早期信徒梁发等,都显示了岭南在古今中外宗教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但学术界对岭南宗教的研究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长期以来无一本通论性的著作出版,尤其对其在解放后的发展状况或有意回避,或难以置笔。本书对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与基督新教在广东省的传播、发展及其在解放后的革新等方面进行详细的论述,并对某些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从而弥补了学术界的一项空白。本书系广州市人文历史基地项目。

总序

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中心,珠江水系东、西、北三江交汇处,内可与长江和黄河流域等中国腹地连为一体,外可经南海达东、西两洋,通往世界。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广州自古至今,不仅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大港,且为岭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秦汉时期,广州(史称番禺)已是著名的商业城市,《史记·货殖列传》载:“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及至隋唐,广州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性的贸易大港。港内舟楫交击,百舸争流,蔚为壮观,不仅世界各国商贾云集于此,而且各地宗教亦在此传播。在明清之际长达四五百年时间里,封建统治者对海外贸易采取“时开时禁,以禁为主”的政策,而广州不仅仍然是中国最大的、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对外开放口岸,而且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它不断吸纳和消化各种异质文化,使之在这块土地上交融、共生与发展;同时又不断地将西方文化传递到中国内地,使其逐渐融汇于中华文化之中。至19世纪中叶,广州这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又在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虎门销烟、三元里抗英、太平天国运动、黄花岗起义、国民革命、广州起义……中国近现代几乎每一段历史都深深地烙上了广州的印记;林则徐、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鲁迅等许多革命先驱和文化名人都在广州留下了他们活动的踪迹。当改革开放的大潮在神州大地涌起



时,广州又以其特殊的区位优势 and 兼容并蓄的人文环境,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创造了世界为之惊叹的经济奇迹,也创造了富有新时代特色的广州城市文化。

在漫长的岁月积淀与历史传承中,广州不仅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风格鲜明、多姿多彩的人文遗迹和历史景观,留下了许多意蕴深长、可歌可泣的民间故事与英雄史诗,而且形成了一种多元、兼容、开放、务实并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城市文化。探讨广州历史渊源,追忆广州前尘往事,发掘广州文化内涵,从而缅怀前人,激励来者,无疑成为广州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有鉴于此,广州市委宣传部从广州市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的需要出发,按照优化结构、合理布局、重点突出的要求,于2006年初批准成立了广州市人文历史重点研究基地,以期通过基地建设,“扶持有广州地方特色的研究,推出有广州特色的研究成果”。

广州市人文历史重点研究基地成立以来,以广州大学为依托,以一批年富力强并具有较高学术造诣的专家学者为骨干,结合广州和岭南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需要,围绕广州社会与城市文化的内涵、特点、流变和发展规律等相关领域,展开了深入的学术考察与研究。在此基础上,基地将以系列丛书或论丛的形式,陆续推出相关的研究成果,为繁荣广州和岭南地区的文化建设,进一步提升广州的文化品位,作出应有的贡献。

何大进

2007年6月于广州

序言

宗教是文化的一种既特殊又一般的表现形式。说它特殊,是因为作为文化,它以其特有的表达方式和涉及范畴而有异于其他文化品类。一般性,则是指历史上,宗教是一切文明或非文明人类群体最直接和最普遍的文化形式或载体。近代以前,各种文化形态几乎都可以纳入宗教、泛宗教或准宗教的畛域。所以,学术界常以佛教文明、儒教文明、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来称呼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而影响至巨的几大文化圈。宗教是经过时代的不断陶冶、大众的审视选择而最富有促动力和凝聚力的精粹文化。

从宗教的内部结构来看,它的教义、宗教机构、礼仪和道德规范等四大要素,与文化的联系至为密切。

制度化的宗教都有其系统的教义,如佛教的四谛说,基督教的上帝创世、原罪、天堂地狱说,伊斯兰教的“六大信仰”(即信安拉、信先知、信经典、信天使、信末日、信前定)等,实际上曲折地反映了古代先民朴素的本体论和宇宙观,是对天地万物起源、人生肇始与终极归宿及处世方式的认识与解说。这些信仰观念,由一系列信条所组成,其原始形态常常为一套神话,依此所编纂的各种圣典,从内容到题材,丰富多彩,其中有神话、歌谣、传奇、历史、政论、小说、诗歌、戏剧等,可谓人类文化的百科全书。

宗教社团所构成的各类形式的组织,是团结和联络信众的一种

社会机构,从世袭制、师承制到任命制、选举制,或是世俗制度的变体,或是世俗制度的滥觞,由历代传统积聚而成,反映了各种制度文化的变迁与演化。宗教活动的场所,是建筑文化的精粹,其内部文化设施和文物陈设等,构成了一个个琳琅满目、最具文化色彩的博物馆。

宗教礼仪是按教规进行的宗教活动,它们杂糅各代、各地的许多文化习俗,是人神沟通的象征。举行礼仪时所使用的服饰、器具、圣歌、程式等,极具文化色彩。

宗教的教规、戒律等约束性条文,则构成了宗教的道德规范。制度化宗教的积极性功能在于,它所体现的是人类最崇高的愿望。它不但是道德伦常的保障,而且也是公共秩序和个人内心平和的源泉,在它的影响下,人类变得高尚而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道德价值体系,它们以神的威慑和感召,把人的现世需求与终极归宿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教徒在信仰的支配下,自觉遵循神意,服从天命,来处理人与人、人与国家、人与自然的关系,规范自己的行为 and 良心。因而,宗教在社会控制、社会整合、社会福利、公共教育以及政治与经济事务中,承担着神圣的道德使命。曾经在古代和中世纪长期充当特定地区各国国教的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在千百年的演化、发展和变革的过程中,其道德体系更增添了较多的现实理性成分,其庞大的道德监护网,一度变得君临一切、包罗万象。宗教的一系列文化设施与活动,如法事、教育、出版等,与维护其传统伦理道德多有关系。

至于宗教在传扬过程中尽可能借用各种世俗手段,如文学、艺术、哲学、伦理、法律,甚至经济与政治的非精神力量(宗教往往亦是其原始萌发的滥觞)来展示自己,弘扬自己,更反映了宗教的文化凝聚与承载功能。

人类从分散走向整体,从孤立走向合一,得益于民间交通、使者往来、战争等方式,其中最文明、最具推动力的莫过于文化交流。历史证明,宗教传播是接触、碰撞、容纳异域文化的最持久的方式,在文

明史上,留下了书写不尽的国际交往的友谊佳话。

岭南位于中国的南部边陲,是中外交往的两大动脉之一——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岭南文化长期以来融合中原文化与海外异域文化,形成了包罗万象、异彩纷呈的雄浑格调。在这一过程中,本土与外来宗教起了重要的渗透、催化与凝聚作用。从两晋道教金丹派理论奠基人葛洪、唐代佛教禅宗六祖惠能和创建伊斯兰教怀圣寺的阿布·宛葛素到明末清初以来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大潮中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基督新教马礼逊牧师及其早期信徒梁发,以及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和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等,都显示了宗教在广东社会变迁和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都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和传扬,与岭南社会与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广东是我国最早接触外来宗教并保存多种宗教的省份,主要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宗教活动场所 2400 处。目前全省共有信教群众 96 万多人(其中佛教 32 万人,道教 12 万人,天主教 20 万人,基督教 30 万人,伊斯兰教 2 万人),县以上宗教团体 230 个,宗教教职人员 6200 多人,担任县级以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宗教人士 470 多人。^①

广东宗教有如下几个特点:①四大宗教齐全,历史悠久,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除中国本土的道教由北往南传入广东外,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皆由海路经广东传入中国。且佛、道、伊各教在广东传播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②宗教对外交往密切。广东毗邻港、澳、台和东南亚,是祖国的南大门,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先行地区,对外宗教交往频繁,涉外宗教事务越来越多。③宗教文化遗产丰富。四大宗教在广东传播历史悠久,积淀了比较丰富的宗教文化,如佛教的南华寺、光孝寺,道教的冲虚观,伊斯兰教的怀圣寺,天主教的石室圣心堂等寺、观、教堂,享誉海内外。④地域特色突出。一方面四大宗教与岭南文化相互影响,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宗教人文景观,另



一方面在地理分布上具有一定的区域性。全省信教群众、宗教活动场所和教职人员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发达地区和粤东、粤西广大农村。^②

广东省宗教人士和信教群众拥护党和政府的领导,积极投身经济建设,热心支持社会公益事业,努力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1990年以来,广东省宗教团体和寺、观、教堂创办工厂、商店、招待所、餐厅、幼儿园、安老院等生产和社会服务机构 187 个。许多教徒聚居村努力发展生产,脱贫致富,模范完成国家各项任务。各宗教团体和寺、观、教堂还发扬爱心和热心公益的传统,积极捐款捐物,支持教育、卫生、公益事业和灾区、贫困地区。据统计,1990 年以来,广东省宗教团体和宗教人士为扶贫救灾和社会福利事业捐款捐物达 2 亿多元,为广东省的建设引进海外投资和捐赠 3 亿多元。如 1998 年,西江流域和长江、松花江、嫩江流域相继发生水灾后,广东省宗教界捐款 600 万元,为抗洪救灾事业作出了贡献;2001 年,广东省宗教界开展“支持大西北扶贫百万大行动”,共筹款 216 万元,其中捐款 100 万元支持新疆和田地区卫生事业;广州市宗教界支持民族教育联合会先后捐款 1000 余万元,支持西部和本省民族地区的学校建设;2003 年广东省宗教界积极做好非典型性肺炎的防控工作,为支持抗“非典”工作捐款 600 多万元。^③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积极开展了宗教方面的对外友好交往。据统计,1980 年以来,全省各宗教团体和寺、观、教堂先后接待了来访参观的境外人士达 3 万多批、40 多万人次。与此同时,广东宗教人士也积极走出去,广交朋友。目前,广东省各宗教团体与世界各大洲几十个国家的教会均有来往。广东省宗教团体多次邀请香港、澳门的宗教人士到广东参观、交流和联谊,并经常应邀到香港、澳门以及国外参观访问,进行宗教交流。通过这些交往,增进了与境外宗教界之间的了解和友谊,宣传了我国的方针政策,引进了数以亿计的海外投资和捐赠,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祖国统一和广东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④

二

佛教的创始人为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的悉达多·乔答摩(约前563—483年),后世尊称其为释迦牟尼、佛陀(简称为佛)、如来等。佛教于两汉之际分南北两条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广东地处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故早期到岭南传播佛法的是以西来梵僧为主体的僧侣群体。据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记载,大月氏沙门支强梁接由天竺经海路抵达交州(州治番禺,即今广州),于东吴孙亮五凤三年(256,即魏曹髦甘露元年)七月于交州译《法华三昧经》6卷。这是有可靠史料记载的最早到广东传播佛法的梵僧。东吴末年,西域僧强梁娄至到广州,于太(泰)始二年(266)译出《十二游经》一卷。西天竺(今印度)梵僧迦摩罗,于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随商舶抵达广州,在城中建三皈、仁王二寺(寺庙确切地址已不可考)。这是广东建佛寺的最早记载。迄至梁代,泛海到广东的梵僧日益增多,且多为开宗立派之名师巨匠。例如,于梁普通七年(526)乘商舶到达广州的南天竺高僧菩提达摩(?—536)被视为禅宗西天(印度)二十八祖、东土(中国)初祖和少林寺的创始人。从汉末至南朝,佛教在粤中和粤北地区已有较大影响,佛寺已初具规模。仅广州城内就有佛寺10多间。

在隋朝,禅宗三祖僧璨大师曾入粤,再次将禅宗法门带入岭南,直至六祖惠能大师大倡南禅顿教于曹浮,几使岭南佛门尽为禅门苗裔。唐代的岭南佛教出现了鼎盛的局面。西方梵僧继续来粤译经传法,同时汉地僧徒也从广东经海路前往西天(印度)取经,佛教文化交流由单向的东被变为双向的互动。佛教宗派中的律宗、禅宗、密宗均得到广泛传播,尤以禅宗为盛。

宋元两代和明朝前期,广东佛教其他宗派走向衰微,而禅宗却一枝独秀,出现了既不受佛门清规制约,而又以做佛事为谋生之道的“市井僧”人。明代前期,佛门委靡,岭南佛教在沉寂中缓慢发展。

明清易代,南粤大地烽火连天,清初岭南的寺院尼庵成了抗节自全者的政治避难所。这些在南天巨变中遁入空门的遗民僧相当于“政治和尚”。因此,清初的岭南佛门表现出了强烈的政治色彩。民国时,岭南许多寺院或被占,或被毁。教内的有识之士为挽救危局,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复兴佛教运动。一些高僧大德在粤的讲经弘法活动推动了广东佛学研究的活跃和佛教团体的成立。

解放以后,社会的根本变化给佛门带来了新气象和新变化,佛门弟子结束了长期靠化缘和供养维生的生活方式,走上了农禅并重、自食其力的发展道路,僧尼的政治地位有了很大提高,僧伽参政议事的热情高涨。一些僧尼被推选为省、市、县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推动了广东佛教界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广东佛教界的建立人间净土的“人间佛教”思想获得了发展。到1988年,全省在册僧尼1800人,登记居士25000人。1991年,岭东佛学院正式复办,其后又陆续创办了云门佛学院、定光佛学院、曹溪佛学院等。至2000年,广东全省开放寺庵有962座。

三

道教尊奉老子为教祖,以《老子》(即《道德经》)为主要经典。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建立起来,老子作为道教的教祖受到推崇,是东汉时期的事。楚王刘英为汉光武帝的儿子,他既喜欢黄帝、老子,又崇佛陀,视他们为神灵而予以祭祀。可见,东汉初年,老子已被神化。道教的最早组织黄老道创立于何时不得而知,但汉桓帝亲自奉祀黄老道,于此又可见延熹时期(158—167)道教已有相当影响。

黄老道于东汉末年分成两大支派,一派为太平道,其首领为张角;另一派为五斗米道,即后来的天师道,创立者为张陵(即张道陵),其子张衡、孙张鲁相继而使之得以发展。太平道、五斗米道分别被张角和张鲁直接用来作为发动和组织农民起义的纽带,大大扩展了它们的影响。但张角领导的农民起义很快被统治者镇压下去,

太平道从此不复存在。张鲁建立的政权持续 30 多年后,亦于公元 215 年降于曹魏,曹操把张鲁及天师道的骨干迁到魏都邺城。后来魏为晋所篡,晋又为北方部族所迫迁于建康(今南京)。自此,天师道便在江南广泛地传播开来。其中,张鲁的第三子不愿受封,携祖传印剑入居江西龙虎山布道,创立龙虎宗。此宗后来又被称为正一教。正一教于宋后,发展为道教的大宗。

真正有史可稽、最早进入岭南地区传播道教的当为西晋南海郡太守鲍靓,《晋书》称“靓学兼内外,明天文河洛书”,又“尝见仙人阴君,授道诀,百余岁卒”,另一著名求仙者许迈“往候之,探其至要”,但“莫测所终,好道者皆谓之羽化矣”。可以说,鲍靓是岭南道教的开创者。

对岭南道教发展影响最大的是鲍靓的女婿、东晋人葛洪。葛洪生于西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原籍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县),晋光熙元年(306)葛洪为避战乱,应新任广州刺史稽含之邀赴广州任职。稽含尚未到任即遇害,葛洪由是滞留广州,先在浮丘(今广州市城区中山七路与光复路交界处)炼丹弘道,后得到南海太守鲍靓的器重,并以女嫁之,在越秀山麓建越岗院作为修道场所,让葛洪夫妇在此修道,兼替百姓治病。葛洪创立了道教丹鼎派,成为道教神仙论的理论奠基人。东晋咸和二年(327)葛洪到博罗罗浮山炼丹。他在岭南从事道教的理论研究和炼丹术、医术的实践探索先后达 18 年之久,对岭南道教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罗浮山也从此成为岭南道教的一个重要基地。

隋唐之际隐居于罗浮山的著名道士苏元朗首倡的内丹学说,经晚唐、五代至北宋,发展成一种独立而系统的道教理论体系,北宋以后的道教,无论北宗还是南宗,都可统称为内丹道教。

唐宋时期,统治者扶持道教,道教地位上升,因而道教在岭南得到进一步发展。此时,罗浮山名列道教十大洞天中的第七洞天、第三十四福地。以罗浮山为基地的广东道教,盛极一时。但不久唐宣宗即位,推行佛教,打击道教。后来,唐宣宗为求长生不老,信奉仙术,

重召轩辕集入京,广东道教又得以发展。

五代时期,后梁贞明三年(917),刘龚在广州立国号南汉(建都于广州现今教育路一带),在葛洪炼丹旧址开炉炼丹,又在罗浮山建天华宫和甘露亭、羽盖亭、云华阁等。

宋初,陈崇艺在广州葛洪炼丹处修炼,广州知州、经略蒋之奇建朱明馆。宋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广州佛教开元寺(今光孝寺)易名天庆观(元代改为玄妙观,清代更名元妙观),崇奉道教。宋皇祐年间(1049—1053),道人李之先于新会结坛修道,邑人以此加以祭祀,名为李先生祠,后改称隆兴观(一称龙兴观)。元祐二年(1087),宋哲宗对罗浮山“葛洪祠”赐额为“冲虚观”,从此盛名长存,为华南道教之首,后又为全真道十方丛林之一,称之为冲虚古观。韶关、连州、惠州、潮州等地均在此时建有道观。宋宣和元年(1119),天宁万寿禅寺(今光孝寺)再次改为道观。由于宋朝对道教的尊崇,加上南宗五祖的名宗地位和较大的影响力,广东道教不断发展。

元代朝廷对道教采取双重政策,有扶有抑,先扶后抑,加剧了教派之间的矛盾与分化。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道教正式分为正一、全真两大派别。

明代道教不受重视,全真道一度较为沉寂,正一道则在明朝历代帝王的崇信下,较为活跃,广东各地道观不断趋向于面对社会和民间。明崇祯十六年(1643),越岗院加建一座三元宫,祀奉三元大帝,为省内道教一重大道场。

清初,朝廷对全真道实行保护、开放政策,允许其大规模传道,全真道各派尤其是龙门派得以中兴。

民国时期,广东道教以广州地区、惠州地区、梅州地区、粤北地区为主,但受当时社会和政治的影响较大,兴盛不一。据民国27年(1938)的有关记载:广州有正一道馆(包括祈福道馆)近百间,正一道士百余人。抗日战争时期,三元宫再次败落,宫中只余道士数人。抗日战争胜利后,三元宫得以恢复,入宫人数日益增多,每至三元节人如潮涌。惠州地区的罗浮山冲虚古观,在抗日战争中期曾被改为

罗浮中学校址；元妙观的神像被国民党军队砸毁，观中的三清殿、玉皇殿偏殿后来又 被侵华日军焚毁。

新中国成立后，广东道教界人士衷心拥护党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响应破除迷信、提倡科学的号召，正一道由此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近百家正一道观相继关闭，广州道教只剩全真道。1955 年 7 月，广州只有 3 间道观、31 名道士，皆属于全真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宗教界拨乱反正，全面贯彻落实宗教政策，广东各道教宫观逐步恢复活动，有的重修，道教活动场所焕然一新，广东省道教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随着道教宫观活动的恢复，广东各地道教社团组织纷纷建立。从省府到地方，先后成立了道教协会，团结道教人士，协助政府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维护宫观秩序，保障宗教活动的正常进行，并积极开展海内外各方面的友好交往。

四

从汉代起，广州已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海上交通枢纽之一。至唐代，广州已经成为国内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吸引了大批外籍商人到此经商。在唐宋时期入粤的外籍商人中，尤以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和大食商人 居多，人们称其为“蕃客”，其活动场所，史书称之为“蕃坊”。他们除从事各种贸易外，还建立宗教场所进行宗教活动。蕃客长期在广州经商，“与华人错居，相婚嫁，多占田，营第舍”，“或取科第”，落籍广州。宋人所著《萍州可谈》卷二称：“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逐渐华化，其后裔即为“土生蕃客”或“五世蕃客”，成为广州回族先民的组成部分。

唐、宋时期，省内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大多是从国外入粤定居的商民。元代，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向福建泉州转移，原住广州蕃坊的蕃客也大多东迁泉州。元至正三年（1343）广州怀圣寺毁于火。至正十年（1350）由浙江省官员到穗主持重建，其时怀圣寺周围

仅有信伊斯兰教的萨都拉等 17 户,留在广州看管怀圣寺和先贤古墓周围的穆斯林公共坟场。

明成化四年(1468)南京回回军首领羽士夫、马黑麻等,率领回回军 1000 多人,南下广东平乱,在各驻军营地相继创建了东营清真寺、南胜清真寺和濠畔清真寺。至此,光塔街、南胜里、濠畔街和小北湛家园等地区周围,已形成 4 个回族穆斯林小聚居区,俗有“四坊”之称,一改唐、宋、元时代穆斯林主要为外国侨民和集中在光塔路蕃坊的状况。

明、清时期,广州各坊穆斯林分别向各坊清真寺献产或献金置产,逐渐形成广州伊斯兰教的公共经济基础,先后建立群英堂、绍圣堂、颂圣堂、康寿堂、顺成堂、祝圣堂和长顺堂等组织。清代后期,各清真寺先后刊印中、阿文经文典籍,开办经堂教育,兴办慈善公益等事业。

进入民国,省内伊斯兰教各项事业有所发展,广州市成立了第一个伊斯兰教社团组织——中国回教俱进会粤支部,增建东郊清真寺,并在原有经堂教育基础上增办两间女经堂。民国 34 年(1945)8 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回教协会广州支会成立,教务活动恢复正常,广州新建安老所、慈幼院两个慈善组织。怀圣寺成立文化部出版宗教书刊。

解放后,党和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伊斯兰教的社会政治地位显著提高。阿訇和穆斯林同各界人士的代表一起参与国家和政府大事的协商研究,参政议政。全国和省、市、区各级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都有本省的阿訇和穆斯林当选。历史悠久的广州怀圣寺和先贤古墓被列为国家级和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多次拨款维修。

改革开放后,省内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人数剧增,1994 年统计为 7665 人,1998 年增至 12536 人。据 2000 年人口普查,有正式户籍的共 28727 人,连同暂住的约 7 万人左右,主要分布在广州、深圳、珠海、肇庆、佛山等珠三角一带,从事工商学农、政企医经等各行各